



包拯 身前后事

BAOZHENG
SHENQIAN
SHENHOUSHI

张国华
Zhang Guohua

撰

聚焦
包拯

● 司马光：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

● 欧阳修：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

● 沈括：天性峭直，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 曾巩：拯为人不苟合，未尝伪辞色以悦人。

● 李鸿章：忌拯者，且谓朝廷自此多事。

● 胡适：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有福的人。

中国经济出版社

包拯 身 前 身 后 事

BAOZHENG
SHENQIAN
SHENHOUSHI

张
国
华

撰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拯身前身后事/张国华撰.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9

ISBN 7-5017-5301-6

I. 包… II. 张… III. 包拯—人物研究 IV. 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144 号

责任编辑:张新安

封面设计:悬壘工作室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75 260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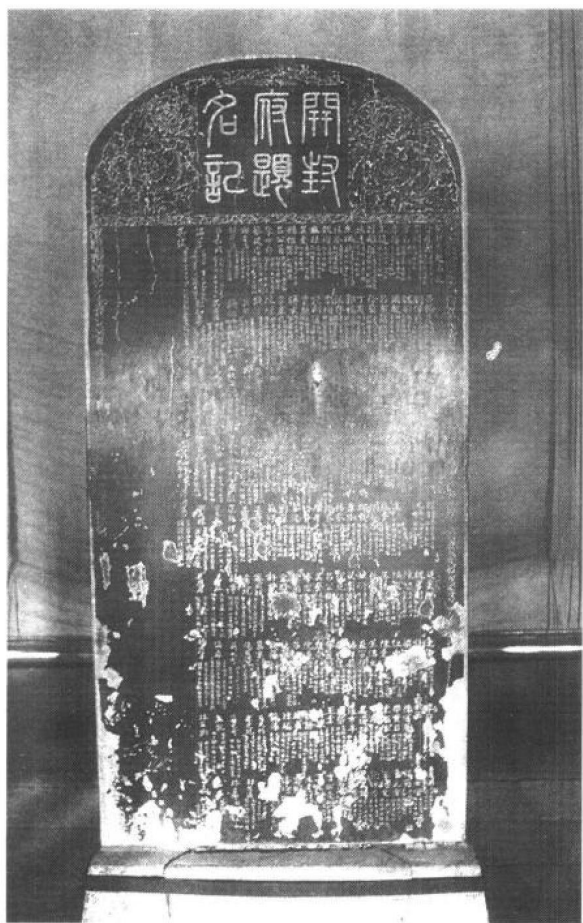
印数:8000

ISBN 7-5017-5301-6/Z·740

定价: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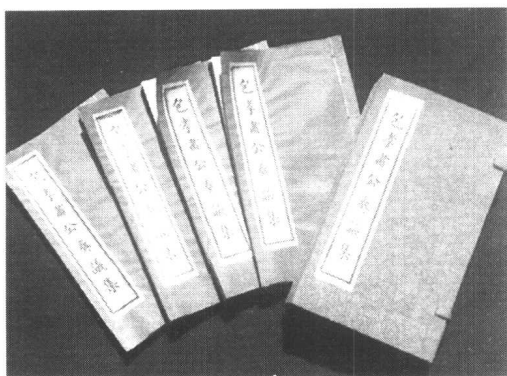
图为开封包公祠大殿展厅包公铜像



图为开封府题名记碑，现存放于开封博物馆。碑中详实记载了北宋王朝 148 年间，共 183 任开封府尹的名字、官职及任、离职时间。包拯是第 93 任开封府尹，他知开封府共一年零四个月。由于历代百姓对他无比敬仰与爱戴，刻有他名字之处被后人摸磨下一道深深的指痕。



图为梁启超珍藏的一幅包拯画像



图为包拯奏议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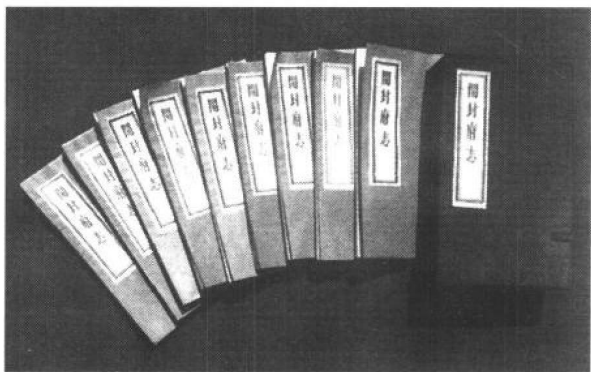
图为合肥包孝肅公墓园正门



图为开封包公祠正门



图为合肥包公祠东侧，有一玲珑秀巧的六角亭，内有一口井，故称井亭，又称廉泉亭，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包氏后裔请当地举人李鸿章之孙李国衡修建的。相传贪官饮此井水“头忽痛”，廉吏饮此井水则味寒而香烈。



图为宋开封府志记载包拯政事活动的分册



包拯逝世后墓地出现两处,一处在其出生地安徽合肥,另一处在河南巩义北宋皇陵。1973年文物部门发掘合肥包拯家族墓群,出土了包拯的棺骨及墓志,确切证实包拯埋葬在合肥,不在巩义,巩义只是包拯的衣冠冢。图为包拯巩义墓。



图为包氏部分族谱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
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包拯書郡齋壁 劍南詩案

这是包拯留下来唯一的文学作品——一首五言诗。原诗如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貽来者羞。

包拯家訓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
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
堂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工刊石
鑒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錢氏年譜
卷之八
錢氏年譜
卷之八
錢氏年譜
卷之八

包拯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于大堂之中。
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工刊石，鑒于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 相统一的模范官僚(引言)



包拯,北宋著名的官僚。千百年来,他以仗义为民请命、与民伸冤除害闻名于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爱戴与敬仰。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口碑相传,世代不衰,并敷彩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2000年末,北京某大学人文学院一伙年轻人整理出100名中国古代著名官吏,每人分成若干项,在Internet上问卷调查。结果包拯的知名度和亲合度都位居第一。这使我联想到,毛泽东在1927年所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记载,一个老农民奋力保护南区东富寺名为“包公老爷”的两个菩萨的场景。看来包拯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这说明在包拯身上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经过不同时代的塑造已成为百姓表达理想、寄托希望、倾诉情感、寻找安慰的永恒符号。这个符号可以理解为强烈的平民意识;刚直、干事、干净的行政品格;公理正义的像征;美好社会人格的寄托,等等总扩为“包公精神”,这是众多中国古代人物少有其比的。

近几年来,有关包拯的形象活跃于传媒,这对弘扬“包公

精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有些作品随意戏说,或者附会演义,或者纯系虚构,使包拯成了一个“神人”加“俗人”,其崇高的象征意义似乎有些淡化。对此,世人虽然能够理解,但也多少有些忧虑。长沙一位老者讲:“这种搞法,我们有些看不懂了。”看来,这不只是一个文艺的表现形式问题,这里似乎包含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还包拯以历史的真实,不只是我们的责任,更是社会的需求。本书本着探真求实的宗旨,以历史上包拯真实活动为依据,遵守“事实有来历,推论有根据”的原则,对包拯一生作全景式的描述。特别是对以“犯颜抗谏”闻名的包拯能仕途平畅,善终于参与总掌国家军政的副枢密使任上的个中原因作重点探讨。

二

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从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环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传统戏曲把他说成被父母遗弃,由嫂子(包拯系独子)带大成人,用于铺垫包拯的身世和他对百姓疾苦的熟识,此种演绎可以理解,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包拯二十九岁考中进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外出做官,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为之追求的。但老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这使得包拯面临离家做朝廷命官还是在家侍养父母的两难选择,在功名与进孝中他选择了后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包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死对头欧阳修也客观评价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

出发点就在于此,这种根深蒂固思想是不可改变的。

忠与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内涵,在包拯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与孝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评价一个人的“孝道”并进而可以推论出一个人的“忠”。忠孝可以说是旧时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所高扬的思想人格都是集忠孝于一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无不如此。包拯从小窃慕前人之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具有浓烈的孝忠观念乃是包拯追求的理想人格。由于古代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国同构机制,孝亲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又泛化为忠君观念,忠孝有时不能两全,社会一般提倡移孝作忠,但包拯进行了相反的选择,这种有悖于一般人的选择,是包拯对“忠孝”独特理解的结果。包拯讲,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尽孝,怎么能对国家尽忠呢?

从以后实践来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诺。他的好友吴奎称颂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这是旧时社会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所能做到的两个重要标志。当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终生坚守孝义高于一切,不孝无以为国的行动理念,在这点上包拯自身的优势得以凸现。据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三

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一方面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从内心深处感激他,歌颂他。另一方面源于包拯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成为后来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载,包拯为人刚直,

敢于忠言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劲正之臣,他一生坚守“大奸必摧”的原则。吴奎在他《墓志铭》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在人们曲意随从面前,坚持正道,在人们迎合权贵面前,他依理凭据坚持激烈的抗辩。包拯仕宦二十六年,在当时的官僚群中,他的地位、声名不及范仲淹、韩琦、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但这些人的人格魅力同包拯比要稍逊一筹,以及时而由政见之争蜕变为意气之争,加之行为的不检点,这些人几尽终生处于朋党纷争之中,这一点包拯显然老道的多。

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包拯从政时,上距宋太祖开国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开国时期那种朝气蓬勃、励精图治的精神,已逐渐消失,官员大都变得懒散,不少人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尽心尽力进行自我设计。这样选拔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是当时社会一种客观需要,这给从小就“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显示与人迥异的才华提供了机会。

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视谏官的利用,从而对权幸之辈有所打击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气,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实际是谏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辉无不集中于此。北宋台谏是有别于以往的一种监察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台官与谏官事权相混,合成一势,成为“人主之耳目”,并享有“风闻言事”无需查实的特权。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里,一度被太后剥夺的皇权虽然重新回到仁宗手里,分量却不像原来那样重了。君臣就国务展开争论,甚至台谏与皇帝直接对抗均时有发生。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无疑与吏治涣

散、政事不举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见的政治氛围。台谏制度和台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著名的直言敢谏的台谏官除包拯以外,还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唐介、吴奎等人,时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成为社会舆论中心。黄燕生在《宋仁宗、宋英宗》一书里载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曾入皇宫中参加道场法事活动的和尚回忆说,有天晚上,仁宗皇帝忽然前来观看,看了很长时间。皇帝显得很高兴,下旨:“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众僧纷纷致谢。仁宗又走近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有文字论列了。”当时这些和尚们都感慨不已,堂堂一代君主,以微物赐僧,尚如此畏惧言官,可见皇帝也不好当啊!这种制度安排使得皇帝都感到不要给谏官们太多的理由进谏,这于自己的面子大有好处。

针对这一现象,张其凡先生认为,仁宗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三足鼎立,互相制约,使政治上显现宽松局面,这点分析应该说是恰当的。台湾学者普遍认为,包拯生性耿直,皇帝能容忍他过激的谏言,这与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算包拯有福赶上一个“好脾气”的皇帝。北大孔繁敏教授认为仁宗与包拯是特定时代的君臣之遇,这一评论是到位的。

四

包拯一生政治上主要表现是积极的,他的思想充满了改

革的色彩,他进行谏言,是他要求改革的一种积极手段。由于希望看到光明的东西,所以痛恨黑暗的东西;由于希望干事、干净的人能够进入相应秩列,所以对不干事的人大加弹劾。包拯上章弹劾宰相宋庠,说他当政七年,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说他固位无耻。其实,宋庠只是属于庸碌无能的大臣类型,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严重罪过,这种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说不上有太大的问题。包拯认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样,必须有贪赃枉法的才能算有罪过,国家重臣,没有政绩就是大过。听到这样的话,千年之后现代官者又作何感想?包拯独到的吏治思想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即使现在也有我们很多可效法之处。

包拯把弹劾的矛头对准侥幸取巧的皇亲国戚张尧佐,对准胡作非为的宦官阎士良,对准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酷吏王逵……,弹劾这些人物,要有胆量,要有勇气,要有正直无私的精神。得罪他们本身同时,而且有时还会得罪皇帝,还会得罪他们的朋党及利益共同体。包拯置这些于不顾,不避权贵。他自己说:“除君之恶,惟力是视。”实际做到“摧压横猾”、“大奸必摧”的地步。包拯等人在净谏、弹劾方面的不懈努力,对于当时的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个仁宗朝,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虽然受到某些优待,但还没有发展到干预大政阴谋弄权的地步,那些滥用权势,胡作非为的官僚也因包拯等谏官的弹劾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击、受到限制。这同包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对这些势力有所斗争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北宋整个一代,包拯是对统治集团内部的陈腐势力、危险倾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一个代表人物,取得了较大成果,对其后各代的政